

张謇与长江的不解之缘

□黄正平

张謇“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新时代解读重要视角之一，写在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南通两周年之际。



长江对于江边的每个人来说，就是一条生命之河、文化之河。

南通，万里长江入海口。自古以来，长江奔腾而下，把江岸线不断东推南移。斗转星移，沧桑巨变，昔日荒芜的江滩变成了如今繁华的城市。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张謇，不难发现，这位杰出的楷模和先贤，念兹在兹，情深意长，对近代长江文明和近代江海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至今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与实践的伟力。

情系大河，对长江有深切的感悟和超前的研究

南通面江而立。长江对张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从跨江而来的张氏家族到19世纪50年代出生的张謇，在长江边长大，多次跨江而行，对长江有独特的感悟和认知。1853年7月，张謇出生在坐落于长江边的海门常乐（今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从他家去江边，就是三十里地；从他家去海边，也就三四十里地。江，对他来说，是不远的存在。早年的求学赶考，宦游经历，使张謇常常行走于长江水路，对长江非常熟悉。江与海是成年以后的张謇认识世界的重要视角，也成为他日后改造中国、打造南通的重要领域。

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张謇，通过冒籍才考取了人生第一个功名——秀才。以后他多次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有成功也有失败。最佳的成绩是“南元”，南方人参加顺天乡试考得再好也只能是次于解元的“南元”。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岁大寿，增设了恩科，张謇在翁同龢大力举荐和鼎力帮助下荣登一甲第一名，达到学业上的人生巅峰。26年的科考历程，历经艰辛。他经历了乡试6次，会试5次，共90天；县州考、岁科试、优行、考列、录科等试，10多次，共30日。40岁时想着屡试不第，而年迈的父亲仍在为自己操心，张謇深感惭愧，“乃尽摒试具”。心灰意冷的张謇参加最后一场会试是在父亲的坚持下被动赴考的，而这次却一举中的，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张謇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从水患到水利这个重大课题既有浓厚的兴趣，也有远见卓识和理论上的建树。水利，一则利国，一则利民。他认真研读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清初靳辅的《治河方略》等前人的水利著作，积累了丰厚的理论知识。当时科举考试多就水利出题。他参加考试时就曾3次遇到关于治水的策论题，光绪五年七月会试，论题为“江苏水利”，光绪十二年三月礼部会试，论题为“河工”，他都考出了好成绩。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张謇参加殿试，殿试题也是关于水利的《水利河渠要旨》，他功底扎实、见识出众，一举考中状元。《张謇全集》中，关于水利建设的文章有190多篇。在这些文章中，张謇深刻论述了水利建设对于内政外交、治国安邦，对于经济建设、强国富民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认为“水利者，农事之基也”、“江之治否，与内政外交均有关系”、“而江则可治，国权可保”，“长江，国家之江也，治江，国家之责也”。“治水之道，贵乎上下蓄也，彼此统筹，必无划疆而治之水利”，“治十里之河者，目光应及百里之外”。实践中张謇对水、水利也是情有独钟，他曾担任民国政府农商部长并兼水利局总裁，后因政见不同而主动请辞。治水，对于张謇来说，可谓毕生的追求。多少年间，他把目光紧紧聚焦于淮河、长江、黄河。据对首部《张謇全集》的初步统计，他写过的关于河流的文章中，淮河最多，长江第二（有10多篇），黄河第三。

张謇对长江极为关注，很早就重视对长江的治理。他主张治水必须标本兼治，统筹规划，上下游地区合力而治。治长江水当从下游始，即从南通开始。1894年在北京参加殿试时，他提出了“治水先从下处入手”的治江主张。其后经年，张謇积极谋篇布局，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治江三说”理论，提议设立长江讨论委员会、江苏境内长江干流宜作统一规划、分段治理，等等。南通长期受到淮河之患，又有长江坍塌困扰，1911年，张謇主持成立南通保坝会，倾心治水、防洪、护岸以守护长江安全。他特别聘请年轻的荷兰人特莱克来通，担任专职的驻会工程师，用先进治水理念和技术，治理长江之水和南通境内之水，并开办学校，培养本土的水利工程技术人才，体现了强烈的科学精神、开放理念和坚定的人才观念。

气象条件与水灾、旱灾直接相关，为此，张謇1914年就在南通设立了测候所，进行天气预报。即便到了暮年，张謇依然奔走在保坍工地上，沉浸对治理长江的进一步思考上。尤其令人感叹的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牵挂的竟然还是他心心念念的水利工程。1926年8月1日，已有小恙、身体不适的73岁老人张謇冒着酷暑，来到长江边视察沿江保坍工程。回去后病情加重，8月24日在南通病逝。

据张孝若在传记中回忆，1926年夏天，他当上了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父亲认为疏浚和下游保坍关系密切，就想写一篇东西给他，告诉他江流历史，指导应保方针，更多的是概括提供自己的经验。文章中叮嘱孝若，历年变迁值得关注，“工程宜求世界最精最新之程式”。此文写成二十多天后父亲去世，算是水利著作的绝笔。

纵观张謇一生，对于水患变水利，他既有远见卓识，又有学术专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实践业绩，其中，对长江的治理与实践，更是事必躬亲，具体而微。

开路先锋，推动南通对接上海

1843年，上海早早地成为中国的开埠城市。

张謇从海门去京城，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海路，海路就是先到上海，然后经沿黄海、渤海抵达天津的塘沽，再从陆路经北通州抵京。张謇第一次途

经上海，与江北全然不一样的城市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5年，新科状元张謇因为父亲去世，归家三年守制。在办团练中更多地认识了黄海，特别是家乡海边的广阔滩涂。不久，从两江总督张之洞处接领创办纱厂任务的张謇，首先邀约的便是南通的通董和上海的沪董。只是私人办厂实乃全然新鲜之罕事，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土人出身的张謇不可能一下子谈拢，张謇不得不一次次地去上海筹措办厂资金，也对上海这一商业之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深深感到它与封建皇都的北京全然不一样。用他后来的话说此处“乃万国竞争之要冲”，集聚了人流、物流，还有信息流、资金流，等等。总之，经商办厂是离不开上海这一远东第一大都市的。

到了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终于在唐闸通吕运河边办成开业，张謇遂在上海设立了“沪所”，即大生纱厂驻上海办事处，然而其职能要远远大于一般意义上的办事处，俨然是大生纱厂设在上海的总部。

1903年，对张謇来说是蓬勃向上的一年，一是师范学校办成，终于形成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齐头并进的局面，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梦想始成现实；二是去了一趟日本，看到了明治维新仅35年后的日本百业兴旺、民众安居乐业的实际景象；三是他站立在天生港镇的长江边，决意在此建设南通通往上海的交通枢纽，通源、通浦两个码头建成，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天生港大生轮船公司运营，在上海也建成了大达码头。这是张謇事业通往上海、通向世界的物理原点和空间起点，也是在这一年，他真正实现了自幼就有的极其美好的跨江梦。这是张謇对长江、跨江和长江航运尤为重视的显著成果。从此，南通和上海之间，宽阔的江面上，张謇经营的客轮和货轮往来如梭，昔日“难通”的江北小城也由此从长江走向世界。

张謇，可谓是长江之子，他留给我们的，是大江奔流东去般的伟岸形象，是长江波澜壮阔般的传奇人生。张謇对于长江的深情，正是南通人对这条朝夕相伴的大江深厚感情的缩影。祖祖辈辈的南通人生于长江边、长于长江边，与江与海相伴的历史变迁中，南通人民既与水患作斗争，又与水利相共生，锻造出了艰苦奋斗、敢于拼搏的人文精神，也塑造了崇文重教、包容并蓄的城市品格。可以说，南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长江文明共同拥有、和谐共生的岁月流畅史。

“第一城”，离不开张謇，也离不开长江。

张謇在经营南通中，积极利用江海自然禀赋，优化布局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城三镇”城市布局，并逐渐形成崭新的城市格局，主城区定位政治、商业、文化中心，工业相对集中在唐闸镇，天生港镇则承载起运输、物流的职能，建成港口运输区和交通枢纽，而拥有美好风景的狼山一带兼具宗教文化、休闲旅游等城市功能。依江而建的“一城三镇”，其中两个就在江边，焕发起长江文明的近代光亮，南通一时令国内外瞩目，成为全国1700多个县中的“模范县”。

其实，张謇的家族遗存和近代创造何止在“一城三镇”，只是此处是张謇事业成就地、集中地，更是他企业家

精神的孕育地、实现地，工业化进程浪潮澎湃，城镇化风起云涌。在张謇的祖籍地，通州就有张氏祠堂，以及他创办的第二家垦牧公司——大有晋盐垦公司。

在张謇的出生地，海门就有他的故里遗存，以及他创办的大生三厂。而在当时还是一望无垠的海边，他开创性地举办通海垦牧公司，筑起挡浪墙，创办了大生副厂（即大生二厂），海滩上的启东拔地而起，雏形初具。而在如东东部，他办起了大豫盐垦公司，带动海滩上形成新的集镇。南通沿海一带涌现出海复镇、常乐镇、三厂镇、三余镇、大豫镇、丰利镇等数个较为发达的集镇，开启了江海大地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并延伸到了盐城沿海，波及长达六七百里的南黄海岸。传统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模式在南通试验初见成效，民智开启、民风改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呈现难得一见的近代风貌和现代风华。

因为有状元企业家张謇直接、全面的推动，而且持续了整整三十年（1895—1926年），滨江临海的南通终于成长为近代城市中的翘楚。同时期，这块土地上还有从政的韩紫石、同样办实业和教育的沙元炳，与张謇一起，致力长江北岸的治理和建设，人称清末民初“江海三杰”。这样，上世纪初的南通，也有了较高的辨识度，概括起来就是：江海交汇的一方土地，依江而建的千年古城，跨江而立的近代名城。

“中国近代第一城”，是张謇在南通的伟大创造，丰富了远古以来的长江文化，在地处长江下游铸就了占理念之新、得开放之利、领风骚之先的南通现象，其领域覆盖八千平方公里江海平原，既是南通比之古代史的优秀杰作，也是近代长江文明的新天和典范，在这个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区域特征下创造了长江文明的特殊形态和不同类型——近代江海文明，造就了南通发展史和长江文明史的历史高度和一时辉煌。是对长江文化、近代文明的双重历史性贡献，繁荣发展了我国长江经济，赓续绵延了中华长江文脉。

张謇，可谓是长江之子，他留给我们的，是大江奔流东去般的伟岸形象，是长江波澜壮阔般的传奇人生。

张謇对于长江的深情，正是南通人对这条朝夕相伴的大江深厚感情的缩影。祖祖辈辈的南通人生于长江边、长于长江边，与江与海相伴的历史变迁中，南通人民既与水患作斗争，又与水利相共生，锻造出了艰苦奋斗、敢于拼搏的人文精神，也塑造了崇文重教、包容并蓄的城市品格。可以说，南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长江文明共同拥有、和谐共生的岁月流畅史。

南通拥有了300多公里的江海岸线，江是南通的生命，海是南通的世界。因为有长江，南通得以发文明之先机，因为有张謇，南通得以在近代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新时代的南通，地理区位处于下游，工作状态力争上游。作为江海交汇之地，既是长江的结尾，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支点、长江经济带的未来龙头。今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座滨江临海的大城市一定能在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征程中贡献南通新力量、展示南通新形象、创造南通新辉煌。

史海回眸

消失的农家肥

□何台

草木灰、老墙泥、干脚土，这是几十年前农村普遍使用的农家肥，现在消失了。草木灰，也许偶尔能见到，老墙泥、干脚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草木灰是植物（草本和木本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过去，农家都一个灰堆堆放草木灰。草木灰属于不可溶物质。草木灰肥料为植物燃烧后的灰烬，所以凡植物所含有的矿质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草木灰质轻且呈碱性，干时易随风而去，湿时易随水而走，现在有人认为它有污染。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相对分子质量为138。其中含量最多的是钾元素，一般含钾6%~12%；其次是磷，一般含1.5%~3%；还含有钙、镁、硅、硫和铁、锰、铜、锌、硼、钼等微量元素。不同植物的灰分，其养分含量不同，以向日葵秸秆的含钾量最高。在等钾量施用草木灰时，肥效好于化学钾肥。数十年前，草木灰是一种来源广泛、成本低廉、养分齐全、肥效明显的无机农家肥。现在，随着电饭煲、电磁炉、煤气灶的广泛应用，烧柴草的农户少了，草木灰也很少能见到。

过去，农民住的房子大多是泥墙草屋。泥墙上泥土多年处于“休耕”状态，具有一定肥力。在乡村缺肥料少粪便的年代，人们想起了用老墙泥来埋麦苗。生产队安排人员专门到农户家中换墙泥，即把老土墙放倒后，将墙泥敲碎，然后把敲碎的墙泥挑到农田里埋田。老土墙的墙泥挑走后，需要重筑土墙。重新筑土墙也由队里安排人员。

筑土墙，又叫“打土墙”。队里安排几个人会打土墙的劳力到换过墙泥的人家来。一般是两个人过来挖些熟土，两个人和泥。和好了泥，众人一起赤脚踩泥，不时还要翻动一下，把下面的泥翻到表层上来不断地踩踏，等到泥土踩踏得“很熟很熟”了，才算可以。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开始打土墙了。两人站在屋外，轮流用直齿锹（直齿锹的形状就像钉耙齿直立的样子）把踩好了的泥垒了起来，垒一层，拍打一遍，直到垒到屋檐为止，越高往高处垒，用的力气越大。然后等到土墙风干了，再用直齿锹慢慢地将墙面铲光了。这样整个换土墙的工程就算完工了。

现在，老百姓住的房子地上贴的是地面砖，这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不要说水泥地、地面贴砖等，过去，哪户人家用砖头铺地也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了。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是烂泥地，我们全村也没听说哪户人家是砖头地。烂泥地，人在屋进进出出，脚在泥地上踩来踩去，会把外面的泥土也带进屋里，沾到泥地上，日积月累，泥地上便生出一个个凸包。另外，过去，一个家庭好几个小孩，特别细小的孩子将大小便撒在地面上，大人用小锹铲去，地上又出现了一个个凹塘。这凸凸凹凹的地面，既脏也难看。老百姓把家中众人踩踏的泥土叫“干脚土”。干脚土固然是有肥力的。在那个“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来源又极少的年代，干脚土就成为一种肥源，“铲干脚土”就成了一项农活。铲干脚土一般都在每年的初春时节。这时麦苗正处于开春后的生长期，急需肥力。于是大规模的铲干脚土农活开始了。人们扛着铁锹、挑着畚箕，进家入户，将那敲鼓凸凸的、黑油油肥腻腻的泥土铲出来，敲碎，然后用畚箕挑出去，直接撒到麦田里。将表层干脚土（一般在5~8厘米左右）铲净后，再从河边大圩上挑来新土，将屋内地面铺平、夯实。这样，泥地不再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地面平整了，看上去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老建筑

砖圆仓

□杨建彬 金茂娟

矗立于通州区刘桥镇新联大桥西南隅的砖圆仓，始建于1973—1974年间，陆续建了3座，现存两座。为腾出地盘建造南通县新联粮站大楼，另一座于1990年拆除。与之类似的储粮仓，在南通地区已属罕见。

砖圆仓，系圆筒形建筑，半圆形顶盖，墙体上方分布着4扇窗户，顶尖部位设一个面盆大小的“出气孔”，供储粮时透气之用。刘桥镇的砖圆仓一东一西，间隔20米，建筑格局基本相同。

半个世纪的岁月沧桑，砖圆仓的外墙粉刷层已经斑驳陆离，墙体已较大面积裸露，圆顶表层已显现出灰黑色。东侧的一座墙体是青砖，用水泥、水石灰、煤渣搅和砌成，内径12米，高度5米，库容量约350吨；西侧的一座，墙体是红砖，也是用水泥、水石灰、煤渣搅和砌成，内径10米，高度5米，库容量约300吨。

原新联公社是传统的农业大镇，新联的征购粮数量，在全南通县处于领先水平。那时，新联大桥的西引桥将新联粮站截然分隔为南北两块，北块虽也有三栋房舍型仓库，但储量高峰时就显得十分吃紧，不得已，只能在站内1600平方米的青砖场上，设法垒“天囤”。所谓“天囤”，就是用宽度40~60厘米不等的芦席，一层层加高垒成圆筒状，天囤四周用草帘遮挡，囤顶用稻草铺盖，犹如茅草屋，一座天囤一般装20多万斤粮食。整块场地上，垒起了十多个天囤，囤与囤之间的间隔，只一个人可以通过。

天囤毕竟是露天的，对雨的抵挡能力有限，因此，不得不考虑增加新的储粮库房。因为圆柱体容积大，筹建砖圆仓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国家也是出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考虑，多囤积一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建造砖圆仓工程，是请唐洪建筑站前来施工的，先后用了半年多时间，仅垒制一座圆顶就花费了半个多月时间。施工时，一天仅能垒6批扁砖，待凝固后，加以踩踏，再依次向前推进。内墙壁全都喷刷着沥青，地面部分用油毛毡铺底，再用沥青搅和砂粒压铸而成，防潮性能极佳，粮食在地堆放绝无问题。

砖圆仓投入使用后，大大缓解了粮站的储粮压力，基本上无须天囤储粮了。2004年前后，国家粮食经营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这两座砖圆仓终于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